

科技与社会

当前位置: 首页 > 科技与社会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3期

怨恨对技术合理性的反叛

刘 同 舫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 技术合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作为现代性运动的必然结果, 充分彰显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理性安排世界秩序, 以摆脱命运的偶然性的欲望与能力。技术合理性在建构技术社会的过程中, 集技术功能、社会功能和精神气质结构功能于一身, 不仅重新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 而且重构了人的精神气质结构, 尤其透射出在以技术合理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怨恨的积聚过程。

关键词: 怨恨 技术合理性 生存性紧张 技术代码

研究现代性问题, 不仅能从历史的社会结构来规定和把握, 也能通过人的精神气质结构来规定和把握, 甚至某些领域, 将历史的社会结构视角和人的精神气质结构视角结合起来考察, 其对现代性问题的把握将更清晰、更准确。现代性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 它既是一个在制度组织、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颠覆性改变的运动过程, 也是一种在理性的价值系统下产生的新的精神气质。按哈贝马斯的话说, 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而在这项“设计”活动中, 技术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技术的进步与理性的发展, 导致了“工业化世界”的出现, 赋予了人们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人们“设计”了新的经济政治制度, 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在这“新的世界里”, 技术与理性具有无上的权威, 它们的结合而产生的技术合理性似乎成了“必然”的代名词。由此可见, 技术合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作为现代性运动的必然结果, 充分彰显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理性安排世界秩序, 以摆脱命运的偶然性的欲望与能力。但自近代以来, 技术及其合理性秩序带来的破坏与伤害之深, 令人扼腕痛惜, 导致了学界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然而, 技术合理性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 由于技术合理性在“新的世界里”对古典的价值观形式的重构, 并形成新的“价值秩序”, 改变了人的实存本身的样式, 它甚至已成为人的精神气质结构的问题。所以, 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 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自身的领域之内, 并企图在技术合理性范式内通过进行目标与模式的调整而解决问题, 已经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技术合理性导致的最深刻的变化是置换了原有的历史价值观形式, 而使自身成为技术社会的价值观形式的客观根基, 从而导致人的精神气质结构的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舍勒的怨恨现象学与社会学分析方法, 可以发现怨恨的精神气质在技术合理性形成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中已在逐渐积聚。因而, 通过考察技术合理性和怨恨之间的关系, 能更好地认清技术合理性的内涵, 由此提出治疗技术合理性不合理之处的方子来, 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一、技术合理性的局限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通过形而上学之后, 黑格尔之后的流派向一种合理性理论集中”。^[1]合理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主题之一, 是对于哲学史上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其对于理性的发展历史和作用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自启蒙以来, 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的力量, 认为通过理性而发现的理论和实践规范能有效合理的重新建构社会。这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 合理性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旨在用“合理性”的模式和标准来重新构筑一个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 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曾在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从而使“合理性”一词涉及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因而, 合理性便是现代转型时期而产生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范性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然而, 这样一个过程却同样蕴涵着不合理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种合理性是被社会精英所认可的合理性, 大部分的民众对这种演进过程并无发言权; 由此精英理性假借了合理性的权威构筑社会控制基础的合法性。而在近代以来的技术社会, 技术力量的影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显以及其似乎无所不能的前景，使得技术合理性成为现代性合理性问题的核心。虽然技术与理性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巨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技术合理性自身也承继着合理性过程的不合理之处，以及技术具有自主性等因素，技术及其秩序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与伤害。故伴随着技术的蓬勃发展，对技术与技术合理性的批判也悄然兴起。

自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始，这种批判逐渐达到其高潮。在马尔库塞眼里，“技术合理性”构成了精英们控制社会的基础。这一社会统治的标志可在经济思想、管理方法和技术设计中发现。^[2]所以，技术合理性导致的将是一种政治合理性和精英价值合理性，这种政治合理性是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而这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是权力通过技术合理性而得以组织、实施和合法化的。哈贝马斯曾指出，“技术给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巨大的合理性，并且证明，人要成为主人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和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设备的屈从。因此，技术的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理性的工具主义视野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3]

安德鲁·芬伯格的进一步论述指出技术合理性是一种囿于社会情境，受到技术主体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格局等社会因素所影响的社会建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合理性是一种技术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有权力参与技术设计，建造技术秩序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具体说来，技术合理性是对技术设计过程具有话语权力的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利益关系、价值愿望的整合而成的一种技术秩序。其核心在于精英的“技术设计”中包含的融合了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结构功能的“技术代码”适应了统治体系的需求，使得占有主导的话语权力者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来设计和实施技术，从而维护了自己对技术秩序的控制，建构技术的价值主体自身的价值理念，压制了技术发展的其他可能性。所以，技术合理性不仅仅是选择手段的规则，更是组织的独立性和生存价值理念的原则。^[4]因此，各种特殊的社会利益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技术代码，精英们的技术知识和价值意志霸权由此成为可能。

总之，技术合理性在建构技术社会的过程中，集技术功能、社会功能和精神气质结构功能于一身，不仅重新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而且重构了人的精神气质结构。而由于“技术设计”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等级造成了人们在生存原则上的危机，在人们的精神气质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分析这一烙印的具体形成过程和具有的特点，甚为必要。

二、现代性价值理念中的怨恨精神气质

现代性作为一场总体性转变的历史运动，包括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人的精神气质结构的转变。在这场运动中，历史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新的历史价值理念的形成，浸淫在这种新形式的价值理念结构中的现代人，其精神气质结构、实存样式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一旦体验结构的品质转型，对世界之客观的价值秩序之理解必然产生根本性变动。”^[5]尼采就曾在其《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精神气质结构的变化对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的形成的巨大作用。在尼采看来，怨恨是一种“不能通过采取行动作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的心理情绪，其本身的形成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即“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6]这种对价值观念形成的简约检审认为，怨恨是奴隶道德的动机结构。

舍勒在批判尼采的现代性道德理念与基督教之关系的观点时肯定并沿着尼采的设问旨趣，更加清晰详细地检审了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心理形成机制。通过运用现象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把握这场历史性的运动，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根源。

在对怨恨的描述和界定上，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的具有隐忍力的心理情态，其后果是“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相应的价值判断”。^[7]从现象学上看，怨恨的出发点是报复，经恼恨、恶意、羡慕、妒忌发展到阴恶，最后引起反应的诱因即使消失，这种感觉冲动依然存在，将成为体验过程的固定形式，并形成特殊的生活经验。由此可以看出，怨恨的形成原因在于受伤害的个体或群体的在体性情绪在内心奔腾却由于体力或精神的虚弱而不敢发泄，只能强忍着，其实质乃在于“怨恨涉及到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8]受伤害的个体或群体由于自身的无能感、虚弱感，将受伤害感受为命运的安排，最终形成此在(Dasein)和所在(Sosein)的生存性伤害，怨恨便由此强烈积聚。当然，生存性伤害的意识存在于比较的心理结构中。“比较者在生存性价值比较时感到自惭形秽，又无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获取被比较者的价值，被比较者的存在对他形成一种生存性压抑，比较者于是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9]从社会学上看，由于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上的实际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与其自身的定位不相符，由此产生社会性生存价值的比较，一种社会生存无力感便很容易产生，怨恨的心态也在这种“没落的生命”现象中产生。由于群体生存的社会结构中规定的“相应的法律地位及其公共效力同群体或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怨恨的心理动力就会越聚越多”。^[10]在现代的价值理念中，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也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由于个体或群体自身的实际能力、实际权力并不平等，由此导致的社会性存在价值危机仍然会导致怨恨的产生。甚至，由于现代的职业分化导致的身份与其存在的价值比较，也会产生怨恨心态。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由于话语权力受限，被支配的社会职业阶层感觉自己失去了本应拥有的东西。

可以看到，考察怨恨的精神气质的形成因素与其实质，对我们认清甚至理清现代性的历史价值观形成和人的精神气的关系有极大的作用，能切实提高我们对技术社会的历史空间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审理出技术合理性所造就的现代技术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与怨恨的内在关系。

技术合理性作为一场现代性的社会建构运动，集技术功能、社会功能和精神气质结构功能于一身，重构了历史的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气质结构，形成一个技术渗透于人类全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技术系统，“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的‘技术社会’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并且处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取而代之”。^[11]于是，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命定的“合理化”历史形式。但是，技术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技术精英理性的实现，是精英权力意志的合法化、正当化，形成的是精英控制社会的基础，而这恰恰成了怨恨滋生与反叛的前提条件。

1. 技术合理性的价值理念与怨恨的气质结构

技术合理性以技术的力量影响和支配现代社会中的人，规划出一种相应的社会秩序结构体系，并要求形成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规范结构和历史价值理念。在这种生活方式、规范结构与价值理念中，技术精英与其他社会强势群体的意志、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得到集中体现，与此不相符的都将受到排斥，这样一来，许多的技术弱势者、技术知识缺乏者、社会话语权力微小者虽然在技术的进步中也享受其带来的舒适感，但在现代社会的竞争生存中却逐渐被排斥、被边缘化，这种无能又无奈的虚弱感却又无法发泄，因为给其造成压迫感的对象是精英理性设计的强大无比的技术系统。由此，当虚弱者在一种在体性的比较中来理解自身和他人时，一旦生存性的比较扩展到对自己形成压制的精英群体，就会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不满，但由于自身的虚弱无能感，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12]表达自身的不满；而当虚弱的个体或群体的这种基于在体性价值比较的生存性紧张感最终被感受为命运的安排时，其生存性价值被伤害了，却只能无奈地隐忍，虚弱无能感最终成为一种生存性伦理情绪，即怨恨心态。结果虚弱者只能是“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或者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的价值观，以取代自身无力获得的价值实质”。^[13]

2. 技术合理性是怨恨心态形成的社会条件

怨恨心态在社会上定位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角度、身份、地位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理念体系的关系。^[14]当个体或群体的自身定位与实际存在之间不相符时，怨恨心态极易产生。在以技术合理性为客观根基的现代技术社会中，技术在实现社会功能时表面是实现一种普遍性的规则和程序，但其实质却是形成一种代表社会强势者利益的机制。

按照福柯的理论，以知识形态和各种与政治相关的言语表现出来的话语体系，与权力交织成一张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在这张网络中，精英们打着“真理”、“中立”、“客观”、“正当”、“合理性”、“社会正义”等旗号骗取大众的信任，实现自身的制度、法制和规则程序。^[15]在以技术合理性为“网络”基础的现代技术社会，是以理性的技术知识体系符合“现代科学知识标准”的真理来控制社会的运行，其合理性体现的是精英的“技术设计”愿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摒弃了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却暗地里代之以新的社会控制技术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但由于个体偶在性的差别和实际教养、实际权力和实际资产出现的极大差异，社会技术只把持在那些资质禀赋高以及有话语权力关系的人手中，即技术专家和其他各个行业的精英，故而技术产品的设计模式和技术的发展方向大都体现了这些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理性、意愿和价值意志。

在芬伯格提出的用以描述反映盛行于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特征的“技术代码”概念中，体现的就是社会精英的话语权力对技术设计的影响。“技术设计”中蕴含的“技术代码”只是部分有话语权力的人们的权力意志，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没有发言权的。国家意志、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群体与阶层的愿望由此融入“技术代码”之中，技术实现的是特殊群体的社会利益。“技术代码”成了现代社会组织和生存的原则，而不仅仅是选择的规则。^[16]技术成为展现理性同权力、金钱相勾结的重要手段，技术合理性却成为社会和文化正当的基础，其结果自是形成了新的隐含的社会等级制度。

但是，现代社会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理念，个体或群体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社会承认，形式上平等的权利）是平等的理念却不胫而行；而实际上，在个体或群体的素养、资质、禀赋，以及权力、资产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导致个体在与人相比时，形式上的平等不能与“事实上的不平等”相协调，这种社会结构极易滋生怨恨心态。在以技术合理性为“网络”基础的现代技术社会中，“技术设计”中蕴含的“技术代码”的不平等，让许多社会弱势个体或群体无法表达自身的需求，又必须承受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的价值观形成的压制，自身的无奈感与无能感逐渐弥漫开来。而且，由于“天赋”的平等理念让社会弱势群体在生存性价值上有与社会强势群体相比较的攀比心理，但其比较结果却是自惭形秽，并且由于自身的虚弱或者无能而无力获取被比较者的价值位置，被比较者对自身形成一种在体性的生存性压抑，伤害、隐忍、无能，最终形成一种生存性伦理情绪——怨恨。

3. 技术合理性与人的自然性生存

由于技术的自主性，技术的发展未必完全在技术精英的理性的控制与支配范围之内，哈贝马斯所谓“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即表明了技术的渗透力量。“生活世界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系统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17]技术合理性的原则使技术支配起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万能论”的渗透使人以为依靠技术的进步即能解决一切问题。然而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灵的空落感凸显了技术的无能与技术合理性秩序的荒唐。技术合理性建构的现代秩序虽然能把人类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由于技术合理性具有的反主体效应，其对人的控制、制约和束缚没有在特定的文化精神结构中给人的欲望、情绪、感情和意志等因素以足够的地位和重视，结果造成人的心灵的无着落感；而其在对待自然秩序的方式上却是一种挑战，即改变原有的自然秩序与自然运行方式，使之全面技术化、功利化。可见，技术合理性的秩序完全有可能将人置于一种生存性的困境之中，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出现全面的冲

实与矛盾，造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人们的生存性紧张情绪、生存性压抑在此完全展现出来，造成了怨恨的积聚，然其怨恨对象是不甚明了的技术合理性过程，所以怨恨对技术合理性的反叛常常只能归结到技术设计者身上，认为技术设计者是伤害人类生存的祸端。

技术，作为人的一种现代性生存方式；技术合理性，作为一种现代的历史社会结构基础，当其不合理与局限性包含着怨恨心态的现象，如何调谐这种情态，以使它不至于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激烈地爆发出来，给现代性运动这项“尚未完成的设计”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技术合理性与怨恨关系的调谐

技术、技术合理性都不可能成为自在的东西，技术合理性的局限蕴含着具有强大力量的怨恨情绪。但是，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技术和技术合理性是不可控制的神话，其异化和局限造成的后果只是技术发展进程不可忽视的侧面。调谐技术合理性的不合理性，祛除怨恨的鬼魅，在于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蕴，构建新的技术伦理秩序，调较人的生存根基和精神气质，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的生态发展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互动的技术政治学。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人们对合理性内涵的理解往往是从实证的和社会学的角度，从而，技术合理性其实就是在技术统治的社会中，以理性为支撑的科学技术的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的绝对权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理性的有限性，压抑了非理性的冲动，缺乏一种形而上学的关怀，没有呈现出合理性内涵中的人文主义倾向及价值论立场，并且，由于人们对于这种带有缺陷的理解的根深蒂固的认同，致使技术精英、知识精英的思维方式和论证逻辑的权威逐步扩大，更加增强了对技术弱者的理性与愿望的压制，技术合理性造就的社会结构成了一种实质上不平等的“天命”秩序，这对怨恨的积聚起了巨大的作用。

技术，其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实践活动，具有实践的内在本性；技术合理性，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生产关系的特殊体现，具有社会关系的性质，前者的异化和后者造就的不平等的“天命”秩序，都必然深刻影响到人的自然的、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其对怨恨的积聚所起的巨大作用凸显了自然、人与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组合而成的系统的冲突与危机。无论是解决这一危机还是调谐技术合理性进程中的怨恨的积聚与反叛，都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蕴，整合不同的社会关系，构建新的技术伦理秩序。马克思坦言：“理论对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18]具体而言，规范与调节技术合理性范畴的关键在于形成具有对话功能和生态功能的新的制度与组织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技术伦理。在当代的技术社会中，个体或集体的技术行为隶属于整个的社会技术系统，其后果已不可能由单一的个体或集体来承担，故而行为主体消失了，所以只有在具有对话功能新的制度秩序与新的技术伦理中，个体或某一集体的技术诉求与技术要求才能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倡技术伦理教育、建立民间技术评估机构、成立技术伦理委员会，通过媒体吸引全社会关注技术伦理问题，尽快形成公民民主参与技术控制的伦理道德机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

然而，新的技术伦理秩序未必能祛除技术合理性的不合理性之处，调谐技术合理性进程中的怨恨精神气质的积聚与反叛，我们不仅要构建起新的技术伦理秩序，而且要认清技术的边界，防止技术合理性在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繁殖开来，同时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技术合理性中具有的价值合理性内涵，从理论上呈现出一种新的从形而上的角度对技术合理性内涵的理解，提倡合理的超越精神和生活实践意蕴，显现人的超生命本性的真实，使人对价值理想的追求既立是于此在的现实情，又追求将来的生活的理想性，体现出人的一种形而上精神，从而使人摆脱“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而投身外部事务的洪流，并摆脱由于这种对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而对世界和文化日益有着强烈的怨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产生了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组带引向外在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19]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则是应将合理性中目的——手段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区别开来，通过建立交往合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其实，更进一步的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互动的技术政治学，形成具有对话机制的社会结构，促进各种被压制的民众理性与愿望和官方的技术设计者之间的交流，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既融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又真正体现各个阶层的利益和意志。如此，则在技术合理性社会中，技术的决策与技术的代码就不仅仅是政界精英、企业集团、知识技术精英等强势群体的单方面的利益和价值意志的表达。由此保证了新的政治伦理秩序对技术及技术合理性评价的多元性，而其最终的根据则是人类利益与价值观的多元性，所以，调谐技术合理性与怨恨的精神气质的关系本质上是调谐人类不同的甚至急剧冲突的利益与价值观的矛盾，这种理念的最根本的展现则是改变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及同此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私有制度，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真正和谐。

技术化生存作为人类全部生存方式中的一种，自有其优越性，然而，技术肆意超越自身边界，损害人的主体性，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却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技术化的生存毕竟只是一种较低级的幸福生活而已，人的高层次的幸福生活存在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存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五、结 语

技术合理性作为现代性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其在触及个体或群体的生存性紧张情态及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破坏的同时，却无力承担人类在生活世界的价值追求，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在技术合理性过程中怨恨精神气质的积聚与反叛也越演越烈。解决这一现代性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立足于生活的实践意蕴，回归人的精神家园，建构一种以价值合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追求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群体共存的安生立命之本。

[参 考 文 献]

- [1] (德)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第1卷) ——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M]. 洪佩玉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15.
- [2][4][16] (美)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9-81, 92-93, 93.
- [3]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M]. 李黎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42.
- [5][19] (德) 马克斯·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M]. 罗梯伦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中译本导言6, 60-61.
- [6][12]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道德的谱系[M]. 周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21, 21.
- [7][10] (德) 马克斯·舍勒. 价值的颠覆[M]. 罗梯伦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7, 12.
- [8][9][13][14]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362, 363, 364, 365.
- [11] (美) 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中文版序言1.
- [15] 冯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18.
- [17]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37.
- [1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88.

(责任编辑 胡志强)

